

## 忆西藏民族学院前身——西藏公学的筹建

原西藏公学党委书记、副校长 白云峰

我是一九五一年进军西藏的一名战士，也是筹建西藏民族学院前身西藏公学的一个成员，虽然我在西藏只工作了七、八个年头，而在公学工作的时间更短，可我爱上了西藏，更爱上了西藏民院。

近年来好些同志告诉我，如今西藏民院的学生已遍及西藏的各个角落，许多人已肩负重任干得非常出色，他们忠于党，热爱祖国，联系群众，艰苦朴素，勤劳实干，深受广大群众赞许。一九八六年我有幸重游西藏，深有这种感受，民院历届毕业的学生已成为建设新西藏的一支坚强骨干，这怎能不使民院的教职员工引以自豪呢？

这种可喜的情景常常使我情不自禁地回想当年初建民院的一些往事。正是在这种心情驱使下，我几进民院查阅案卷，整理出这份简要资料和读者见面，盼能引起民院的师生写出更多更好的回忆录来，向全西藏地区干部和人民介绍民院这座西藏民族干部的摇篮，激励由民院毕业出来的学生更加奋发向上，为西藏人民作更大贡献，这就是我的一点心愿，也是庆祝我院成立三十周年的一点礼物。

一九五六年四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中央代表团团长陈毅副总理带来了中央对西藏工作的指示：“爱国，团结，进步”。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党在西藏的工作要做些为西藏人民能够看得见的建设事业。为此，不仅中央从内地各省调派了大批汉族干部支援西藏建设，同时这年中共西藏工委作出决定，在西藏全区大量吸收培养藏族干部。工委做了培养藏族干部计划上报中央，范明同志给西藏日报写了文章，人民日报也发了消息，各级党委做了大量的工作，这年全西藏地区共吸收了近万名农牧民子女进行教育培养。

可是，西藏上层反动农奴主，从其本阶级的私利出发，反对实行民主改革、反对农奴们的彻底解放，外结帝国主义，内联反动势力，在西藏内外大搞分裂活动，唆使达赖在纪念释迦牟尼涅槃两千五百周年出访印度之际久留印度不愿回国。同时，反动上层也在拉萨不断闹事。因此，中央鉴于西藏政治不稳，民主改革条件尚不熟悉，决定“六年不改，适当收缩”，制定了“五为四不为”的工作方针，只为改革作些间接的准备工作，不作直接的改革准备。于是各级组织机构进行大量精简，汉族干部大批内调，藏族

学员适当处理。

一九五七年三月上旬，中央书记处讨论西藏工作，在京的工委委员与会，关于对藏族学员的处理问题，起初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是，选送五百名政治素质好的进内地民族学院培养，其余部分遣散。会后，住在北京饭店的在京工委领导干部张经武、张国华、范明、王其梅、慕生忠、牙含章、郭锡兰、白云峰和霍正西，在讨论中央对西藏工作的方针时，关于藏族学员的处理问题，我们认为全区现有藏族学员近万人，如果全部遣散回家，反动分子就会乘机挑拨，另外在全藏散布着近万名青年也将失去工作、学习的机会，这不仅可惜，也会造成他们对我们不满，在政治上对我们也是很不利，因此建议中央准许将这些学员送回内地进行培训，为将来改革准备干部。中央采纳了我们的意见。在书记处会议上，总书记邓小平同志作结论时说：“藏族学员凡愿来内地学习的，人数不限，不愿来的，一个也不强迫。你们西藏自己在内地办学。”。根据这个原则成立了西藏干部学校筹备委员会和临时党委，同年七月又经西藏工委上报中央批准，定名为“西藏公学”。

中央书记处讨论西藏工作之后，对西藏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发了指示，工委的中心就移到集中精力搞收缩工作。随着机构的精简，大批汉族干部内调，藏族学员也陆续送往山丹、兰州、雅安、成都等处。六月间工委决定在甘肃河西走廊的山丹县开办西藏干部学校，派汤化陶同志先去负责筹备工作，并请甘肃省委协助。山丹有一个炮兵师的营房，建筑面积约四万平方米，宿舍、教室、食堂、伙房、卫生设施都比较齐全，在这里已集中了一千六百多名学员，这就是初期的西藏公学一分部。可是藏族学员来到以后，一看山丹是个小县城，市面很不繁华，营房又在城外的荒滩上，甚觉荒凉，反映非常强烈。他们说：“你们说内地好，可是这里连拉萨都不如。”就是汉族教职员也不愿在山丹办学。汤化陶同志去山丹后了解到这些情况，向工委作了反映，七月间工委召开会议再次作了认真地讨论，认为不应把藏族学员放在偏僻的地方，这样的环境对于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教育是不利的，决定另选新校址，并将这个任务交给我去完成。范明同志催促我立即起程，更使我心急如焚。七月底我即离开拉萨，决心尽快奔赴内地。可是不巧，到达通天河时正遇河水暴涨冲毁了桥梁，好几百辆汽车被阻于通天河的南北两岸无法通过，致使我在通天河南岸呆了十二天，八月上旬才到达山丹。我查看了学校的情况，向干部和学员做了思想教育，明确答应另选新校址，要求大家暂时安心搞好生活管理和教学工作，以稳定情绪。我还同学校的领导干部一起前去拜访了山丹县委负责同志，请求当地政府对学校的物资供应方面多予照顾。我匆忙地离开山丹到兰州后，同汤化陶同志前去甘肃省委见到了省委秘书长何承华同志，又到省政府会见了马青年同志。经他们详细介绍，了解到兰州市周围找不到适合我们办学的地方。我们就又同到西安物色校址。到西安后有人介绍大荔县有个炮兵营房，经初步了解房舍很少，且距西安较远，交通不便，未去察看。我又同汤化陶同志跑到宝鸡市，看了渭河南岸姜城堡铁道兵的一个营房，建筑面积十万零五百平方米。房舍是空闲着的，我校可以容纳得下，但铁道兵部要留着备用不愿让给。另经宝鸡市委书记郗光瑞同志介绍，我们又看了虢镇四机部办的二六四技工学校的校址，建筑面积六千平方米，房舍、教室、伙房齐全。校舍是

空闲着的，也可以借用，但可惜太小只能容纳几百名学员。我们还看过西安南郊韦曲镇陕西省干部学校的校址，这里多数是土窑，许多窑顶业已裂缝，很不安全，另有少数平房，也难容纳数千名学员。王曲的步兵学校校址我们也去看过，那里不仅房屋很少且已破烂不堪，也是不行。后来我同汤化陶同志去到西安南郊长宁宫拜访陕西省委书记张德生同志。向他说明来意，德生同志风趣地说：“我给你们说个地方，西北工业学院要从咸阳迁来西安，咸阳旧校址他们不用了，我们陕西要，高教部不给，你们西藏‘牛皮’大，你们去要吧！”我们去到咸阳西北工业学院旧校址，见到了该校刘岗同志，他向我们作了详细介绍，并带领我们看了校园、教学大楼、校舍和大饭厅等。告辞后我们回到了西藏驻西安办事处，将物色校址的情况给在京的张经武书记写了一个详细报告，同时也报给工委，建议工委向中央要西北工业学院这个地方。但高教部不肯给我们，经武同志又叫我去四川物色校址。

这时我们兵分两路。汤化陶同志去北京向经武同志汇报选择校址的情况，我去了四川。到达成都的当天晚上就会见了四川省军区的负责同志，他们介绍了几处军营的情况，一处是川北阆中县有两个团的营房，建筑面积五万平方米，只有宿舍、食堂，没有教室，距成都有几百里路程，交通不便，我没有去那里察看。另一处是成都近郊的一个营房，我去看了一下，房舍很少，根本不具备办学条件。成都既然找不到校址就立刻前去重庆，这里有三处军营：一处是璧山县的一个步兵师的营房，经该师的同志介绍，是分散在一百数十里的几个点上，建筑面积共十七万平方米，最大的一处是两三万平方米，驻防部队尚可，如用于办学，就难于进行教学和管理；一处是歌乐山营房，有两万平方米的建筑物，里边已有一所中学占用了一部分；另一处是北碚和马场子的步兵文化学校，校舍分在两处，相距十来公里，建筑面积是七万七千平方米。该校已决定于一九五八年二月迁往桂林，军委拟将这个校舍移交给交通技术学校使用。校部住地环境优美，布满了桔林和花草，象一个公园似的。校党委书记是一位将级军官，他同张经武同志熟识，我受到了他的热情接待，当晚就住宿在他们的校部办公楼。北碚是校部和宿舍所在地，马场子除一些平房外，新建有一幢教学大楼，有教室四十个尚未使用。另外还有一个宽敞的体育场，这所校址是比较好的。但是，重庆这个地方夏季气候过于炎热，是所谓三大火城之一，从高原上初来的藏族年轻人不会适应此地生活习惯，且容易患病，这使我犹豫不决。我住在重庆市招待所里思虑再三，将在成都、重庆两处考察校址的情况以及所看过的各处的条件作了比较，当即写信给汤化陶同志转交张经武同志，建议还是要求中央批准将咸阳西北工业学院的旧址给我们办校。于是经武同志又出面请刘伯承同志同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同志和书记黄克诚同志商谈。八月二十七日工委也电告经武同志就近与有关部门联系解决。十月十七日中央给西藏工委、高教部党组和陕西省委发电并转白云峰同志，同意将原西北工业学院的咸阳校址全部拨给西藏工委作西藏公学和团校的校址。希望该院尽快腾出，以便早日进行教学。这个校址当时校园千亩，建筑面积六万八千平方米。

虽然校址中央给确定下来了，可是校舍一时还腾不出来，藏族学员已陆续从山丹、兰州、雅安、成都来到了西安，城内街道上的许多旅馆都住满了我们的藏族学员。这不

仅不是长远之计，也不是临时的好办法，真使我焦急万分，不得不到处求人借房。首先让西藏团校的学员和教职员寄居在虢镇二六四技工学校。再经陕西省委同意，借到了小雁塔原中级党校的旧址。可是西安市不肯让给，学员进不了校舍，我们再次请示了省委秘书长宋友田同志，经他同意我们的一部分学员才进驻了该处，到十一月份校部也还暂时设在这里，连同西藏歌舞团等共住进了一千三百多人。后又经陕西省总工会负责人吴沙浪同志的协助，借到了省总工会干校的部分校舍，住进了汉族藏语文班的学员和教职员。又经西安市委工业书记冯智同志的协助，暂借到北郊徐家湾一个工厂的部分房屋，住进了一部分学员和教职员，这就是起初的二分部。这样，才把住在旅馆的大部分学员搬进了以上四个地方。这些寄居在各处的学员以及寄读在青海财校的财经班学员，从一九五七年的十月到一九五八年的八月才陆续集中到咸阳本校，团校也于一九五八年三月迁回咸阳。这时公学、团校共有教职员九百多人，学员三千四百多人。

我们西藏公学这个校名是经中央多次研究后才定下来的。一九五七年开始办学，九月十日我们给工委呈报的是西藏干部学校筹备委员会。可是早在八月三日中央已给我校命名为西藏公学了，而我们为什么没有用这个校名呢？这是因为工委接中央电报后，于八月十七日提出学校名称为西藏公学，这本来是很好。但藏族学员看了苏联电影《教育的诗篇》，电影里面所描写的工学是教育改造小偷、流氓的，他们有误解，把西藏公学和电影内的工学联系起来，感到这个校名不好。因此，我们向上级建议改称“西藏人民学院”或“西藏学院”为好。中央于九月一日电告工委：关于藏族学员对学校名称的意见问题，中央认为，如果采用学院的名称，则与培养对象绝大部分是文盲的情况不相适应，而且容易使学员产生在学校设备和生活待遇方面向内地各学院看齐的心理。因此，采用“西藏公学”的名称还是比较适当的。因“公学”、“工学”音同而产生的误解，可以拿抗战时期我党创办的陕北公学和全国解放以来各地创办的民族公学在培养干部事业上的作用来解释，说明这个名称没有丝毫坏的意思。如果实在抵触很大，你们又能提出更恰当的名称，还可以报中央斟酌决定。九月十三日工委电告学校并报中央和各分工委、各工作队，关于在内地筹办西藏学校名称的问题，工委已向中央提出意见，中央复示，偏重在于没有更适当的名称以前，仍以“西藏公学”的名称为宜。这样可以与现在拉萨的西藏干校名称有区别，同时采用公学名称适宜于长期培养程度差别较大的各种学生。因此，确定校名为西藏公学，不要再有更改。

毛泽东主席曾说：“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四日工委指示：“在西藏六年不改的情况下，培养藏族干部是我区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而培养藏族干部的方针，应该是根据勤俭办学的原则，培养共产主义民族干部，为将来的西藏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要培养共产主义民族干部，这就要把学校置于西藏工委的绝对领导之下，在学校领导干部的任用上就是本着这一原则作的。一九五七年九月三日，学校上报了筹建委员会和临时校党委人员组成名单，西藏工委于九月十六日作了批复：临时党委由白云峰、汤化陶、孙瑞、屠庆元、丁心、高启祥、杨述林、牛锦

华、段志远、刘也枫、徐东里、夏时清组成，白云峰任书记，汤化陶任副书记。西藏公学筹建委员会由白云峰、汤化陶、孙瑞、屠庆元、高启祥、丁心、刘也枫、段志远、杨述林、牛锦华、夏时清、徐东里、刘星三等十三人组成，白云峰任主任，汤化陶任副主任。西藏公学筹委会下设有各处室。办公室副主任高启祥，组织处副处长徐东里、汪文彬，教务处副处长夏时清、王观容，行政处副处长杨述林、王彦民（未到职）；西安班主任黄国栋、副主任屠庆元，山丹班主任孙瑞、副主任刘星三。山丹党组由孙瑞、段志远、刘星三、师仰山、郭守义、高凤歧组成，孙瑞为书记。丁心、牛锦华为西藏团校副校长。西藏团校党组由丁心、牛锦华、屠庆元、刘也枫组成，丁心任书记。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西藏工委会议讨论决定并报中央于一九五八年元月十七日批准：西藏公学校长张国华（兼），副校长：白云峰、王静之、汤化陶，并请陕西省委指定一名副校长（后未到职）。办公室主任沙克，副主任屠庆元、高启祥；政治处主任王静之（兼），副主任段志远、陈寿彪、徐东里；教务处处长刘也枫，副处长沈摇斧、王观容；行政处处长孙瑞，副处长韩俊杰、刘星三。顾材民、朱国柱、汪文彬、王湖、张克宇任各部主任，高凤歧、郭守义、徐汉中、尤其翰、王殿香、诺杰拉任各部副主任。西藏团校白云峰任校长（兼），丁心、牛锦华任副校长。

西藏工委于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六日通知，经十二月十三日工委会议讨论决定，成立中共西藏公学委员会，白云峰、王静之、汤化陶、沙克、屠庆元、高启祥、刘也枫、段志远、孙瑞、丁心、牛锦华、张克宇十二人为正式委员，白云峰任书记，王静之、汤化陶任副书记；朱国柱、顾材民、王湖、黄国栋、汪文彬五人为后补委员。西藏公学党委成立后，临时党委随即撤销。由于校党委的正式成立和王静之等同志的到职，从而加强了学校的领导力量。

早在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七日西藏工委通知，经中央批示我区在内地开办之团校定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西藏团校。西藏团校受西藏团工委和西藏公学党委双重领导。

一九五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工委组织部提出公学教育方针征求意见。电报说：培养藏族干部的方针应该是根据勤俭办学的原则，培养共产主义的民族干部，为将来西藏的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学制暂定为五年，前三年以学文化（含自然常识、算术）为主，政治教育为辅，后两年加强政治课比重。政治教育方针应着重进行阶级教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观的教育，树立学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前三年主要进行阶级教育，党的民族政策、爱国主义和增强民族团结的教育，后两年可适当增加中共党史、社会发展史和西藏社会情况、阶级分析。毕业达到初中程度。使学员养成爱祖国、爱劳动、爱学习、团结互助、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示。一九五八年二月上半月，我参加了中央民委召开的民族学院院长座谈会，二月二十五日我在学校党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座谈会的精神，能而又在校务会议和全体干部会议上传达讨论，明确了西藏公学是一所少数民族干部政治学校。它的任务是本着勤工俭学、勤俭办学的方针，通过政治文化教学，生产劳动锻

炼，以期在几年内培养一批忠于祖国，忠于社会主义，忠于西藏人民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学校积极地组织了全体师生认真学习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四日张经武、张国华同志也对学校工作指示，要求贯彻勤俭办学的方针，一切都朴素些。要在干部和学生中提倡劳动生产，养成重视劳动的习惯，学到一些生产知识。藏族学生都是劳动人民的子女，不要丢掉劳动的本色。政治课要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和阶级教育，社会发展史和自然常识也可以讲，但不讲宗教如何不对就是了。根据全国教育方针和民族学院院长座谈会议精神，结合工委负责同志的指示和西藏的具体情况，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学校党委向西藏工委上报了《关于学校教育方针的补充和修改意见》，工委十二月十八日批复同意。这个补充修正意见强调了政治思想教育、阶级教育、肃清地方民族主义的教育以及破除迷信，进而进行共产主义人生观、民族观、道德观和政策教育。学校本着以上方针和精神，在教学工作上强调必须从启蒙教育着手，紧紧掌握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并重，教学和辅导并重，由浅入深，由近及远，学用结合的原则，以逐步提高学生的政治文化素质，完成培训任务。

在西藏工委和陕西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在甘、青、川省党政部门的支援下，校党委、筹委做了大量的工作，克服了种种困难，经过一年零三个月的艰苦筹建，终于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五日正式举行了西藏公学开学典礼，从此走上了正规办学的轨道。